

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



BAOGAOWXUE
ZUOJIAD
BAOGAO

朱子南 著

南京出版社

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

朱子南 著

南京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荣昌

封面设计 王向友

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

朱子南 著

南京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六合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9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178千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4,500册

ISBN 7—80560—200—X

I·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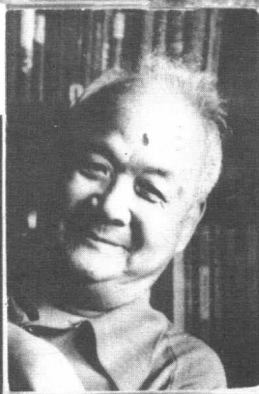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3.20元



谢大光



胡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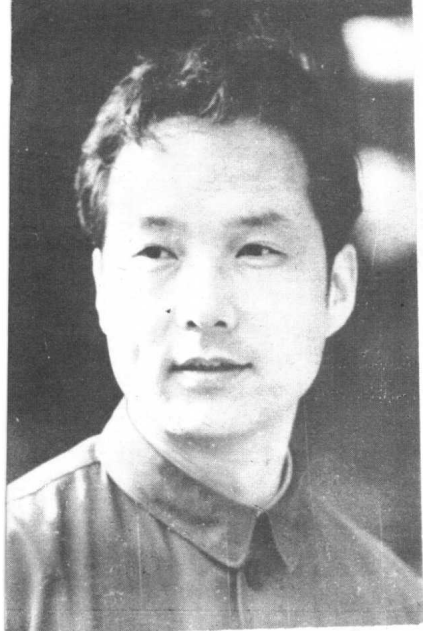
萧乾



陈祖芬



孟晓云



理 由



张胜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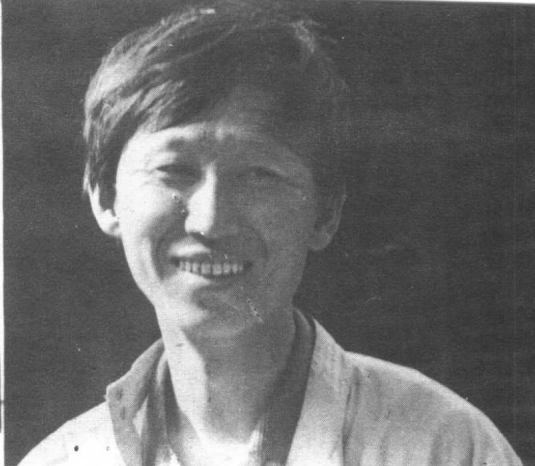
李若冰



李玲修



黄宗英



贾鲁生



肖复兴



柯岩

109 101



朱子南

作者简介

朱子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祖居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，那是著名的观潮胜地，可惜他1932年11月20日于上海出生至今，还无缘观赏。他父亲于小学（文字、音韵、训诂）颇有研究，家中藏书甚丰。受此熏陶，自小便爱上了文学。他最初习作的杂文、散文、小小说刊发于家乡的报纸上，那时还是个中学生。时至七十年代，一个偶然的机缘接触了报告文学，自此便以报告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。1987年开始招收文艺学专业报告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。出版了《报告文学创作谈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）、《报告文学十家谈》（四川文艺出版社）、《报告文学艺术谈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）等专著，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，在报告文学理论、报告文学作家作品、报告文学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上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《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》，以李若冰同志的提法说，是“文艺评论的一种创新”，“他把报告文学作家的形象从各个角度加以描绘，实际上既评论了作品，又使作家的形象树立起来了”。

致子南同志

(代序)

你的《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》，对报告文学作家的研究别开生面，独树一帜，和别的评论家不同。特别是你联系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经历来写，读起来十分亲切。读者从你的报告中，不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艺术成就有所了解，而且透过他们的生活面对其艺术的追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我认为这是文艺评论的一种创新，一种更加生动和谐的创新。我对你的这种形式非常赞赏！读那些刻板说教式的评论文章是件苦差使，我是很少看那些东西的，除非因某种需要才看。读你的“报告”就不同了，你把报告文学作家的形象从各个角度加以描绘，实际上是既评论了作品，又把作家的形象树立起来了。这是一种很巧妙得体的评论样式。

祝贺“报告”的出版，祝贺你的成功。

真正研究报告文学的评论家寥寥无几，你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盼望着，再读到你的新作。

李若冰

1990年2月10日

目 录

铸 情

——记黄宗英…………… (1)

他写出那心灵的蓝天

——记理由…………… (17)

“作品创作了我”

——记陈祖芬…………… (37)

心灵的奉献

——记孟晓云…………… (55)

“柴达木！柴达木！”

——记李若冰…………… (74)

依然追寻，依然追寻……

——记柯岩…………… (101)

梦

——记李玲修…………… (135)

一个圈儿，又一个圈儿……

——记萧乾…………… (156)

呵，青青的爬山虎

——记肖复兴…………… (180)

但求无愧我心

——记贾鲁生…………… (203)

真诚的轨迹

——记谢大光…………… (224)

猫和狗的故事

——记胡平、张胜友…………… (245)

后 记 …………… (269)

铸 情

——记黄宗英

“你又要来考我了。”黄宗英同志以风趣的语言回答着我的要求。那是她来到汉口的当天，我就冒昧地请她能同意，在次日晚上作一次长谈。她答应了。我说：“我是准备了一些问题要提的。”于是，引出了她的这一句话。

这是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，他们为了出版一套“中国报告文学丛书”，约请了一些编委，在汉口举行工作会议；黄宗英同志作为编委到会了，才使我有机会当面向她了解一些她写作的情况。

我是急性子，一月二十五日，一吃完晚饭，就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她。但是，电台的记者已在她的房间里了，黄宗英同志正准备着回答电台记者的问题，以便录音。电台的记者知道我是“预约”了的，表示抱歉了：“只要一秒钟，一秒钟。”

那就等吧，好在只要一秒钟。

电台的同志摆弄好录音设备，请黄宗英谈谈为什么要写《大雁情》。

也好，这正是我所要了解的一个问题。

黄宗英同志面对录音机的话筒讲了，听众，就是电台的三位同志，以及被我拉来一起听黄宗英同志谈的一位《文艺

报》编辑和我。

“同志们问我为什么要写《大雁情》。我回想到1978年春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要我们作为特约记者去采访全国科学大会。我是在粉碎‘四人帮’后第一次去北京。走进人民大会堂，看到科学家们，似乎看到一片野火烧过后的野草在萌发。

“写秦官属，我在1958年以来下乡中认识一些同志，多少了解一些知识分子到山乡去建设，从事科学事业的感情。在困难条件下，仍然献身于科学事业，是可贵的。这是对党的事业的信赖。

“我曾走访许多科学研究机构，那里选一位代表、一个先进分子，竟比搞科研工作本身还要难上百倍。我遇到多少知识分子，‘砸’后余生，壮志犹砺，全不顾累累伤痕，仍然执着地走向理想、未来……如果我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感受，那么，在全国科学大会上，就是有人把秦官属的事情用扩音喇叭对着我的耳朵说，就是我和秦官属同志住在一个房间里，我也不会想到写她。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，经历也并不离奇曲折。只是因为共同的命运、共同的理想，使我和我的描写对象有了缘份。

“作家应该与她所写的对象：人民，同命运、共脉搏。人民的心声，也就是党的利益；因为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。

“秦官属对‘远志’这种中药有兴趣。我曾用《远志新解》这一题目，但比较艰涩，文了些。又曾用过《她？》这个题目，给柯岩同志看了，她说，这象一篇暗杀小说的题目，我又改了。我写了大雁塔，我又写做了一个梦，我希望

大雁把这声音传得远一些。天高任鸟飞，今天能翱翔了，真正看一看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与今天的变化。我们渴望着未来，并发出呼吁：不要让悲剧重演了！这就跟大雁联系上了，用了《大雁情》这一标题。

“我也希望使这一篇文章能发挥一些作用。大雁在春天飞回来的时候，能看到更新的景象。”

黄宗英同志是有着丰富的演员生活经验的。就在今天下午的一次报告会上，面对好几千人，她说，“我是当过演员的，会虚拟和假想，我把满屋子的人假想为跟一个人促膝谈心。”是的，她那将近两小时的报告，确实如同谈心一样，真诚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生活经历，自己对生活的感受、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写作体会，悲痛时，含泪欲滴，高兴时，畅怀大笑。而现在，虽然“正式”的听众只有三人，还有我们两个“旁听”，她那娓娓动听的话语，却象是对着千家万户的收音机在倾心交谈。

我赶紧在笔记本上，又记下了一个准备向她提出的问题。

录音结束了。我把黄宗英同志请到我的房间里——璇宫饭店505室，就在她住室的斜对门——来找她的人太多了，这是避免干扰的措施。

“好吧，你就考吧。”

我赶紧声明，是聊天，是随便聊天，但是，我还是提出了第一个问题，那是刚才听了她在录音话筒前的讲话想起的。

“你是怎么开始从事写作活动的呢？”我想，黄宗英从表演艺术家走向语言艺术家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人们没有认

真研究过。放弃自己所熟悉的艺术样式，离别自己水银灯下多年共处的姐妹，撇下自己为许多人钦羡的“明星”生活，开始新的尝试：写作，究竟是什么在吸引她改换自己的生活道路呢？艺成以后再改行的并不多见，在享有盛名之后，有多少人肯再去作新的尝试呢？黄宗英却偏不，她有一股执拗劲，毅然地拿起了笔……是这位演员要自己探出头来向社会讲话，倾吐自己的喜悦、幸福、悲伤、苦闷、不平和希望？

黄宗英同志谈开了：

“我是怎么拿起笔来的？”

“我从小没想过当作家。我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里，父亲很早就去世了。我是在青岛读的初小——噢，我的老家是浙江温州——日本孩子欺负我们，我们还击，互相扔土块。结果，使全校师生受罚。当时，青岛近海，那是中国的领海，停泊着七十余艘日本军舰。在日本侵略军的威胁下，我们的已带白发的女校长含着眼泪鸣钟集合，带领我们在操场上向日本侵略者道歉。耻辱呵！”

“高中上到一年级，交不起学费了，为了养家，才到了上海，去演戏。那是在四十年代初。我当时十六岁。演员这一行，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。”

宗英同志停顿了一下，似是回味着当时那艰难的历程。我眼前浮现了那个时代上海的舞台；想起了她曾经说过的：演戏，不演汉奸戏，要演有道德意义的；也忆起了她在《星》中所写的话：“在旧社会，演员也可能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和欣赏者，但‘尊重’二字，对我们几乎是绝缘的。”

“在旧社会，红氍毹上，斑斑血泪，水银灯下，步步泥泞。”但是，宗英同志保持着演员的尊严与情操，不为那灯红酒绿

所动——所有这一切，都是那么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叠印在一起了。

那时，解放前，她住在她一位植物学家的堂兄黄宗甄家里，而黄宗甄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了。家中也常有地下党员来往。在1964年，上海市新任的电影局局长杨进开始工作时，黄宗甄曾经告诉宗英：“其实，你们是认识的，他也是和咱们住过一间屋的；他为地下党办事来上海，有时就住在咱们家里。”黄宗英也深情地回忆过，她堂兄对她的帮助是很大的。尽管她在解放前还没有直接与地下党员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，但这样一个环境，与她的气质，决定了黄宗英的正直、胆识，她在探索着走自己应走的路。

这对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来说，是不容易的；但是，当时社会的逼迫，促使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向成熟。也就在1947年，她进了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。

在“昆仑”，她参加拍摄了田汉的《丽人行》，饰演一位以教师为公开身份的革命女性；又在陈白尘等编剧的《乌鸦与麻雀》中饰演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外室。

不少人对《乌鸦与麻雀》中宗英同志的演技是有深刻印象的吧？演反角，在她的演员生涯中并不多见。这一角色，原是拟由上官云珠扮演的，黄宗英准备演的是知识分子的妻子，但上官对演“交际花”、“交际草”厌恶，提出了“咱俩反串”的意见。宗英是这样想的：“演员嘛，演正角反角都是艺术创造，有什么关系？换换型，也挺有意思。”——她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考虑的啊！一个演员，戏路子要宽；正如一个作家，就以黄宗英自己来说吧，她除了写报告文学外，不也写了脍炙人口的诗歌、优美的散文与动人的

电影文学剧本？掌握尽可能多的艺术技巧，才能在艺术之宫中尽情遨游。当然，上官的厌恶演“交际花”之类的角色，也有她的考虑，是无须非议的。

“我的正规学历是高中一年级。”宗英同志接着说，“在旧社会的剧团里，那也算是一个‘秀才’了。解放初，上海市举行影剧界妇女会成立大会时，有的著名戏曲演员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。解放了，我们姐妹们才迎来了新的生活。

“我从演员多采的生活出发，配合演出需要，以惊喜和欢快的心情，随手写下了不少幕前致词、报幕连接词、小朗诵剧、诗、生活散记……随写随丢，没想到当作家。

“我不是想当作家而成为作家的。作家，经常写的人，只能有感而写。”

是的，这一点，她在今天下午“中国报告文学丛书”编委座谈会上的发言中，是说得很清楚的：

“只是因为通过演员的丰富的生活面，我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祖国，看到了人民的美好的心灵和愿望，看到我们的党是真心实意要领导人民走向幸福的明天的。看到这一切得来不易，前进更难，更难！我的写作生涯始于于此。这是我提笔的定音符，回荡于胸际的主旋律，任凭噪音嘈杂，迫使几经变调；任凭弦断琴碎，不忍重调旧曲；任凭蝉寒齿冷，启口难以为声；任凭花媚月娇，一片歌舞升平；我心中的主旋律总是将隐又显，将息复起，将抑又扬……”

就在现在谈话时，她还强调了一句：“现在拿起笔，老是有主旋律在心里回荡——这心中的主旋律是永远在回响的。”